

愛國主義內的三種愛

～愛祖國，愛社會主義及愛共產主義～

沙百里著
梁潔芬譯

(甲) 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上海《文匯報》登載了一篇由《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撰寫、名為「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文章。其中述及愛國思想的說話如下：

這是歷史的潮流。這是祖國的需要。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長久的愛國主義傳統，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經過五四運動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革命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我們的愛國主義傳統遭到了嚴重的歪曲和破壞……而只留下一小批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法家』。這實質上是宣揚了一種極端荒謬的民族虛無主義。……在個別別人身上，那種不顧人格以至國格的卑劣的洋奴思想，那種曾被魯迅痛斥的『西崽相』，居然又沉渣泛起。

……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多才多藝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



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幾千年中，大小幾百次的農民起義，無論規模和次數，都為世界革命歷史所僅見。

……越是我們中華民族面臨危亡威脅的嚴重關頭，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越發激勵而不可動搖，越發顯示出它的戰鬥鋒芒。這一點，在最近一百四十多年中，尤其獲得了震動世界的突出表現。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不僅表現了強大的鬥爭力量，而且表現了強大的進步力量。……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就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統一起來，從而大大豐富和發展了它的科學的革命的內容。……（它）經歷了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飛躍，又經歷了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飛躍。……這樣的愛國主義，是建立在為祖國為人民力爭進步的基礎上的，……因而是根本區別于任何保守、倒退的國粹主義和任何狹隘的、自私自利的民族主義的。……隨着革命實踐的發展，他們（中國共產黨）終於找到了真正科學的革命真理——馬克斯列寧主義。……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近代中國偉大愛國者和民主革命先驅者洪秀全、孫中山的事業的最好繼承人。

……中華民族的一切巨大物質和精神的財富，歸根到底都是全國各族一切從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人們共同創造的。正是在這個偉大基地上，中華民族歷史上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傑出人物。我們的國度，是產生了老聃、孔丘（思想家）……，是產生了屈原、李白、杜甫（詩人）……，是產生了張衡（科學家）……，鄭和、李時珍…孫臏…劉邦…李世民、松贊干布、朱元璋…（戊戌五君子及共產黨的領袖）……。

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已經消滅了有幾千年歷史的剝削制度和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建立起了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有一些人有懷疑。……歷史的客觀真理是：

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它們（目前具體制度中的流弊）是由于種種違反社會主義本性的因素，給社會主義帶來歪曲和破壞所造成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不僅是要消滅剝削……而且是要建立高度民主的先進的政治制度，建立具有共同理想、共同道德和共同指導思想的高度的精神文明。

「祖國落後，有什麼可愛？」對於這樣的理論，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愛國……愛戀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和祖國，這是中國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共同感情……祖國再窮，也是生我養我的偉大母親啊！……正因為痛感于祖國的落後，才甘願獻出自己的一切以至於生命，為改變落後而鬥爭。

「要向外國學習，還要不要民族自尊心？」這是一種不應有的誤解，是把向外國學習同民族自尊心割裂開來，…



中華民族以多才多藝著稱于世。

…對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不能盲目地學，……而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

「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是一種偏激情緒，錯誤觀點。……在舊時代，在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下，那種號稱代表祖國的反動國家機器實質上是剝削階級用來鎮壓人民的工具，因而它實際上並不能真正代表祖國。……但是在社會主義時代，情況完全不同。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掌握在人民手裏……熱愛祖國，就包括熱愛人民自己的國家機器，並且為它的不斷完善而努力奮鬥。……事實上，在文革中，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最先受到最沉重的打擊，然而，他們是偉大的愛國者，（一如）屈原在「離騷」中說：「亦余心之所喜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種熱愛祖國，不計個人安危得失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深刻記取的。

請讀一讀一位中國科學工作者去年在國外參加一次重要國際學術會議期間所寫的一篇短文吧。這位年青的尚未成年的學者……一下子成了會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好幾位外國教授希望他留在北美工作。可是我們這位學者的感想呢？他這樣說：「他們知道我的水平，但是他們不知道我的心。」

……大家知道，「為中華之崛起」，這是周恩來同志少年時代，在回答讀書是為什麼的問題時，所說的話。

……這使我們想起了魯迅的題名為「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著名戰鬥文章。……他說：「說中國人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份人則可，倘若加于

全體，那簡直是誣蔑。」「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有為民請命的人，有為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為全人類服務」的思想彷彿與愛國主義衝突），然而試問一個連對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都不懂得敬愛的人，難道真地能夠「為全人類服務」嗎？

現在有個別人製造所謂青年一代同老一輩革命家之間存在着不可填補的鴻溝的謬論進行煽動，妄動割斷廣大青年同老一輩革命家之間不可分割的血肉聯系；把青年引上擺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而必然離開社會主義方向的邪路，這是完全錯誤和十分有害的。……在當前，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努力奮鬥，就是愛國主義的實際表現。

若從上面所提出的各種不同設難來看，該文章旨在告誡需要信心的一群。其實，愛國的浪潮並非如此大。再者，文中爭辯的情況顯示出，真正的問題並非在於愛國，而更在於對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不錯，「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嗎？」這個問題的確是發自愛國之心。

作者將失去信心的原因全歸咎於文革時期的錯誤措施、政權之誤入歧途、以及打擊社會主義的敵對力量。

為免過於消極，作者亦努力表達了一些較積極的思想。他首先追憶了某些足以作典範的愛國英雄、革命家、以及改革者。他亦嘗試證明在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這種愛國的傳統有其地位並得到發揚。他的論證是實用主義與教條主義兼而有之，就是一方面頌揚獨立之勝利，另一方面又維護「無產階

級革命」的科學真理。作者的最終目標有二：第一是利用愛國情緒以達至國家現代化；第二是用愛國情緒以促進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作者深知，目前在中國，社會主義只可以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存在，所以他把國家的現代化與共產黨的領導等量齊觀，因為，在他看來，前者只有在後者的領導下才能達到。

作者的呼籲，反映了政府的掛慮。過去幾年來政府會視愛國主義為影響精神及物質文明之發展的巨大力量，因而順理成章地在道德教育的口號中，加上「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主義。有時，為使「三熱愛」更明朗，遂引伸為「五熱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工作、愛科學、及愛社會主義。其實，不論是「三熱愛」或是「五熱愛」，畢竟在那些口號中，愛國與愛社會主義總是牢牢連結在一起。

在此，我們無意去質詢這種連結的合理性，更不問它的合法性；事實上，這種連結所依據的原則有不少可商榷之處。在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掛鉤之所以合法和合理，是因為中國的法律依循政府的意識型態而制定。相反，在台灣這樣的掛鉤便不合理了，因為，雖然台灣仍忠於孫中山的社會主義，但國民黨的愛國主義基本上是右傾和反共的。這也可解釋為何蔣介石三十多年來致力於統一全國，但在上述共產黨的文章中，不稱他為愛國志士。

姑且放下合理和合法的問題不談，而來探討一下愛國主義如何能與政治意識型態相連，而在什麼情況下這種連結是有益的。也許，我們可以採用源於毛澤東及鄧小平指示的思想：「在事實中尋求真理」的務實態度去處理這些問題。

（乙）愛國的意義

把「愛國」這個籠統的詞語進一步界分為三種或五種特殊而具體的愛，倒頗有意義。其實，所謂「愛國」，基本上是愛自己的故鄉。在中國文壇上愛慕鄉土是詩文的極佳題材。近代文壇大師魯迅因對故鄉——浙江紹興的熱愛，所以故鄉的風貌、習俗及人物活現在他作品的字裏行間。今日大批海外華僑湧到自己的出生地，以求一睹故鄉風貌。雖然他們發現故鄉的生活水平，不能與僑居地看齊；但他們仍能欣賞祖國美好的一面。這種愛國深深紮根於文化認同上。這種愛國源於同一鄉土及母語，亦出於一種民族的自豪，他們常以自己為中國人及古老偉大文化的一員而自豪。這種愛國之情是基於鄉土之戀慕，進而成為超越省域國界的文化歸屬感。這種歸屬感雖紮根於故土，但最後擴展為「天下一家」的博愛。

「愛國」的「國」字，是以「口」「戈」及「口」組成。意謂：有衆多的人口要供養、枕戈待旦以防禦邊疆、在城牆的保護內定居。直至十九世紀末期，古代所謂的「國防」，是指保護漢族文化免受遠處西域及近在邊陲蠻夷的蹂躪。由於與西方強敵搏鬥，才浮現出「國家」的意識。換言之，國家就是由一群國民所組成的政治整體，這些國民掌握着自己的命運。從此，這個國家的觀念就與被視為抵抗外侮所必具的條件——現代化相連。這種愛國並非源自與生俱來的文化認同，而是有意識地與自己同胞在政治命運上的認同。這樣的意識覺醒，首先在知識份子、改革者及革命家中活現出來。

若從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權、民族、民生）的角度去了解，則現代所謂

的「愛國」，更恰當是稱為「愛人民」。在十九世紀末期，改革者企望建立一個富強的中國，擴闊人民參政的範圍。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就是由一種民族意識而引發，實行推翻滿清以及反抗殖民主義者的勢力。

「愛國」這觀念的演進不止於此，尚有第三種形式的出現，這種愛國的觀念與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相連。自從二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渲染了頗濃的意識型態的色彩。

在五四運動的精神裏所萌芽的各種思潮及主義，特別崇尚「科學」與「民主」，即當時所稱之「賽先生」及「德先生」。不少知識份子，就以胡適為例，便想以實用及科學的方法去解決中國的問題，可是，另有些人則為某些思想家的理論所吸引。這些有系統的理論，以經濟、社會、及政治之改革來解決全球的問題。在共產主義的革命份子之中，有人採取了徹底革命的方向，李大釗和毛澤東就從馬克斯主義之中發現了所謂的「科學的歷史真理」，認為此真理（或定律）會把中國人從宿命論的思想中解放出來。既然「無產階級革命」是歷史演進的必然過程，所以，他們確信中國人在嚐盡了屈辱之後，必會獲得一個光明的未來；中國在受盡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壓迫之後，必會站立起來，推翻那些壓迫者，建設一個獨立而強大的新中國。

當時由蔣介石所領導的革命黨，面對着共產主義這股新興的勢力，不得不定出自己的一套基本原則，為了加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遂引進了儒家的傳統。一九四三年，在南京發動的新生運動，便批評共產主義是舶來品。這個運動強調一種純正的中國民族主義，提倡各種傳統的美德。雖然這個兩營對

立的現象至今仍在，但海峽兩岸的實際情況，却在不斷蛻變中。台灣政府雖十分熱衷於「五千年來的中國文化」，然而台灣人民已日漸西化。另一方面，雖然「國際共產主義的紅旗」仍飄揚於中國大陸的領土之上，但中國已漸漸恢復往日的傳統價值。海峽兩岸都認為愛國是理所當然的事（西歐國家對此神聖之愛已日漸式微），可是，在大陸方面所提倡的是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而在台灣方面所主張的却是反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兩方面都以自己的意識型態作工具來促進中國的偉大，也只有執政黨才可以去決定那一種意識型態能與愛國主義認同。

（丙）開放的與封閉的愛國主義

也許，我們可以用柏克森（BERGSON）所說的「開放」與「封閉」倫理制度來解釋「愛國主義」。共產黨員的守則與《文匯報》上這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承認，愛國主義必需與國際共產主義思想聯結，以防陷入沙文主義或自我中心的圈套。其實，這更是馬克斯主義所要求的，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既是全球性也屬地方性。

列寧認為，民族主義遲早都要歸於幻滅，只是當發展中的國家仍受壓迫時，它權充作暫時性的戰略而已。這種理論雖然如此，在實際場合上却鮮能適用。人們必需先脫離狹隘的民族利益，才能向第三世界、甚至全球的勞動份子開放。

馬克斯主義中的這個要求，導致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產生內部矛盾。愛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很容易流於狹隘，易受掣於家族利益。中共中央政府經常要防止地區獨立主義，以免有害國家的團結。家庭、學校

、鄉里間的種種「關係」，不僅對政府的改革計劃會造成很大阻力，而且亦可替社會的需求及經濟的罪行提供藉口。要應付這種情況的發生，「為人民服務」和「為民衆犧牲」等口號，已失去力量；只有「無私博愛」的秘訣才能助人衝破自我的藩籬。思想上的瘀塞需要精神方面的補救。只在理論的層面上去談「集體利益」，對實際情況於事無補。

強調對國家的歸屬感及主張國家的獨立，亦可產生越軌的沙文主義，這一點魯迅也會在其著作中論及，並視這種努力為徒然無益。事實上，倘若經濟和政治上的失敗落後能用「人爲的倫理光榮」來補償，則造成國家恥辱的責任亦可全推到洋人肩上，而國家則繼續以其豐厚的倫理傳統及國粹去自耀。於是，阿Q的頭雖然被打得又紅又腫，但他仍舊以無故被打而感到自豪。在現代世界的結構中，只有當中國對外開放，與各國交流，它的價值才會得到肯定。只有當一切文化都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彼此的貢獻時，一國的光芒才可顯示於世界之中。如果一方面努力在經濟及科技上促進對外開放，而另一方面又想對外來文化的影響嚴加選擇，甚至排拒，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無疑是漠視了文化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直接關係。倘若一個國家真的擁有積極和穩健的價值觀的話，它不會害怕與各國交流，亦不怕為歪風所襲。「保護文化」的政策並非是健康的「愛國」標記。

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結合的愛國思想，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際共產主義中，找到了防禦「自我中心」傾向的保障。可是，假若它仍然以很狹窄的態度把自己的文化價值統攝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中的話，也不容

易擺脫文化隔離的危機。結果，他們以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腐化為藉口，而對非共產的文明國家的文化價值盲目非議。近日中國推行的「反精神污染運動」，是再次不加明辨地去指責外來的價值，却對中國內政上的失敗不加以注意，因而更彰顯了意識型態與愛國主義結合的弱點。

(丁) 愛國主義與宗教

上述《文匯報》的文章，對中國的宗教傳統隻字不提，使人感到十分詫異。因為像在西方一樣，宗教在愛國方面亦扮演了非常



中國基督徒不懈地為國家服務。

重要的角色，儘管有時它們是支持現行的政權，有時則促成反政府運動，而農民的起義便是一例。我們只要細看宮廷內祈福延壽、祈求國泰民安的拜祖祭天大典，便可知在古代宗教禮儀所佔的重要地位。在歷史上，由太平軍及道教的傳統所激發的黨派，曾經是民間革命的核心份子，他們極力反抗朝廷的當權者；近代太平天國的起義亦牽涉到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北京的天壇、龍門、敦煌、及雲岡的佛教聖地，北京及成都的喇嘛廟，西安的清真寺，還有散佈在小數民族中的宗教聖地，都是今日中國足以向中外旅客炫耀的國寶。基督宗教的聖地就沒有同樣的藝術價值了。尤其為西方的遊客，那些哥德式或拜占庭式的建築物只屬（西方）某時代的仿製品而已。無論如何，這些建築物亦屬於中國歷史的一部份，目前更在「天主教愛國會」或「三自愛國運動」的照料下重開。

「愛國」一詞為中國的基督宗教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在中國的教會史上，尤其是在殖民主義時期，為基督徒而言，所謂「愛國」，就是指有責任去反抗西方的帝國主義。在抗日戰爭時，雖然中國的基督徒在某些傳教士、尤其是雷鳴遠神父的支持下，曾以行動證明了他們愛國；可是他們大都被指責與外國人妥協。近期，「愛國」一詞又加於中國天主教會頭上，迫使它與梵蒂岡脫離關係，因為梵蒂岡繼續與台灣的「反動」政府勾結，所以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雖然中國基督徒在公民的地位上受到懷疑，但他們仍不懈地為國家服務，常常在沒有報酬和最艱辛的環境及勞改營中，默默地工作。也許，社會主義在所走的迂迴道路上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愛國」這個如此美麗的理想變成了某些中國人民不勝負荷的

重担。倘若一方面說承認他們的宗教，承認他們是公民，另一方面却要他們割斷與普世教會的關係，就等於在事實上拒絕他們，把他們置於「敵對」的陣地；而在人民中豎敵實在不應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為。其實，不論基督徒是否屬於愛國會，他們仍不斷地證明自己是愛國者。那些與愛國會保持一段距離的教友，正是為天主教會的普世性而作證。怎能叫他們與遍及寰宇的基督徒大家庭割席反目呢？其實基督徒的愛國，正補充了無產階級的普世性之不足。基督徒既知道如何去熱愛祖國，同時又能向各文化中的人文價值開放。他們的信仰協助他們去分辨什麼是自由資本主義中的腐敗因素。多位教宗亦曾公開指謫這些錯誤。另一方面，他們又謹守基督徒的主要傳統，例如：倫理教育、平衡的家庭生活、工人的尊嚴、關注他人、謀求公益等。教宗及主教們對這方面的訓導，亦不失為一種能為中國服務的精神價值。這些訓導誠為最佳防禦外來不良影响的藥劑。若將基督徒愛國思想中如此豐碩和獨特的貢獻剔除，反而是愚昧之舉，亦證實是缺少真正的愛國精神。最近在某些地區盛行以實用主義來解釋馬克斯思想，這些解釋理應運用於宗教問題上。當有一天中國的基督徒不但被接納為中國公民，而且亦被容許成為真正的信徒時，他們就有可能完全發揮愛國的精神，盡一己之力以服務國家，作出最大的貢獻。